



科尔的“德国政策”与“统一外交”析评

王 超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的德国统一,虽然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联邦总理科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位“富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在其执政后审时度势,制定了比较务实的德国政策;他还充分借助了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缓和东西方敌对局势的同时,稳步发展两德关系,增进民族认同感。他尤其能够牢牢抓住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这一“历史机遇”,凭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开展统一攻势,以及对四大国尤其是苏联灵活地推行统一外交,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再次统一。

关键词: 科尔;德国政策;统一外交

1990 年 10 月 3 日,分裂 41 年的德国重新获得统一。时任联邦总理的科尔,也被冠以“统一总理”的美名。然而,学术界在研究科尔执政时期德国政策和统一外交时,多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德国统一进程加速这一时期,缺乏一个整体、全面的考察。本文将从历届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统一外交发展演变出发,具体考察科尔执政后德国政策、统一外交的特点,力图完整地展现科尔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

一、“继往开来”的德国政策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四大国为了维护其不同的战略利益,又将其逐步分裂为两个国家,并使之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联邦德国在其《基本法》序言中明确宣称:“……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①此后,历届联邦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表达了要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愿望,并且还积极地付诸行动。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毫不妥协地主张联邦德国领导下的统一。但他也深知,联邦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只能扮演推动者或促进者的角色,因而,“……我们要竭力依靠西方盟国的帮助来完成德国的重新统一”^②。于是,联邦德国走上了德法和解、依附美国的西方结盟之路,并借此增强联邦德国的实力,进而希望迫使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实力”和“谈判”便成为了阿登纳德国政策的核心。另外,在国际社会,阿登纳政府还推行单独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以图从外部打压民主德国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双方靠拢。可是,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只持续到 60 年代中期,在东西方大国相互搞“缓和”以及不再坚持德国统一的背景下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民主德国逐步放弃国家统一的立场和“一个德国”的原则,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德国统一问题也因此长期陷入僵局之中。随后的两届联邦政府仍没有摆脱阿登纳时代的禁锢思想^③,只是更强调同苏占区人员、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交流^④。

① Ingo von Münch. *Documen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1976, p. 91.

②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第 2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第 86 页。

③ Klaus von Beyme. *Die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von Adenauer bis Schmidt*. München: Carl Hanser, 1979, p. 159, p. 248.

④ Klaus von Beyme. *Die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von Adenauer bis Schmidt*, p. 162, p. 249.

60年代末上台的社民党勃兰特政府,主张“以接近求转变”,寄统一希望于渐变。勃兰特认为,“必须为克服德意志内部的边界铁丝网和墙壁做出贡献”,强调两个德国“有责任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不互为外国”^①。为此,他全面推行“新东方政策”,即有条件地承认两德现状,积极倡导“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的重新统一”。1972年,两德签订了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但联邦德国仍强调,两德关系是一种德意志民族内部的特殊关系,并重申将继续谋求恢复德国的统一。

随后上台执政的施密特政府,继续强调以《基础条约》为前提的两德特殊关系,声称这是“基于并符合其缓和政策和全体德国人民的利益。”^②另外,发展两德实质性关系,扩大相互间合作,增加人员往来,维系“民族情感”也是其德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还在极力倡导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主张加强北大西洋联盟合作的同时,注重发展同华沙条约国的良好关系。施密特所奉行的这种“双轨战略”,无疑是在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

1982年10月,基民盟主席科尔入主总理府。尽管同东方的缓和政策并非基民盟所创,而且,之前身为反对党领袖的他,曾强烈批评过社民党政府的“承认政策”^③。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执政党的更迭,并没有割裂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的延续性。1983年5月4日,科尔在其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④。就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的具体特点而言,也首先表现在对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的继承性上面。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德国在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他着重突出了德意志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德国内部贸易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意义和作用。

科尔在其首个《分裂的德国之民族状况报告》中写道:“目前,在德意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但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先于国家的建立,而且存在至今,这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⑤这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并不是通过国家来赢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历史、共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确认的。显然,在他看来,与民主德国进行传统文化交流,有利于缓和由意识形态冲突所加深的民族分裂化状态。此外,科尔还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两德经济合作的愿望。另外,他在人道主义措施方面,同样体现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如: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提高民主德国访问者的欢迎费等。这种德国政策的继承性,充分展示了科尔政府务实的风格。

作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其德国政策当然也同时体现了联盟党的传统特点,即毫不动摇的维护《基本法》中有关重新统一的条款。在科尔看来,社民党执政的十几年间,只有勃兰特的内心从未彻底放弃过德国统一的念头^⑥。为此,科尔为政府制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在欧洲和平的框架中,实现一种德国人民可以通过自由的自决,重新获得德国的统一。”^⑦在他看来,保障欧洲的和平是德国统一的基本前提和必经道路;此外,德国问题仍然保持着公开性,它是由欧洲的分裂造成的,其只有在欧洲的框架中才有解决的可能。欧洲融合和德国问题并不相悖。先建立欧洲统一,首先是西方统一,是解决德国分裂的一个步骤。1984年3月,科尔再次指出:“德国的重新统一只有通过欧洲的统一才能和平地实现,这将是一个历史任务。”^⑧由此可见,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更像是阿登纳政府和勃兰特政府德国政策的有机结合。

二、开展多边外交,等待统一时机

在对外政策上,科尔主张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为基础,加强与美国的联盟,以及以德法合作为核心,推动欧洲一体化,积极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革。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安全和缓和政策始终在其外交政策中居优先地位。安全政策主要是指大西洋联盟政策。在这个联盟中联邦德国同美国共同承担着这项现实的义务。缓和主要是就欧洲联盟而言,或者说是承担克服欧洲分裂的责任。历届联邦德国都在努力保持着两项政策的一致性。同时这两项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辅助其“统一政策”的。

1982年10月13日,科尔总理在其政府声明中就谈到:“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⑨。次年,5月3日的政府声明中,他又进一步强调说:“为了克服德国的分裂,我们必须依靠北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的支持,他们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和自由,同时也支持统一的愿望——不仅是德国,而且也是欧洲

①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9~481页。

② Klaus von Beyme, *Die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von Adenauer bis Schmidt*, p. 322.

③ Niclauß, Karlheinz, *Kanzlerdemokratie: Bonner Regierungspraxis von Konrad Adenauer bis Helmut Kohl*,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8, pp. 120~125, pp. 181~187.

④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p. 665~666.

⑤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 881.

⑥ 赫尔穆德·科尔:《我要的是德国统一》,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⑦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 1217.

⑧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4, p. 555.

⑨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 1216.

本身。”^①由此可见,科尔不仅坚定不移地延续了联盟党对外和安全政策的传统,而且还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具体表现在德美关系的修补,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1982年,美苏导弹之争愈演愈烈。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科尔积极支持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导弹。与此同时,他还与里根总统就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天然气管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这些对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使两国关系迅速摆脱了施密特时代的阴影。科尔深知,德国统一已经不只是本民族自己的事,它还取决于四大国,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因此,德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加强了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防护能力——这对身处冷战边缘的联邦德国而言,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进美国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度,这为日后获取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和认可,打下坚实的基础。

德法关系由世仇变为伙伴,不仅结束了双方数世纪以来的敌对与战争,而且还促进并加快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在科尔执政时期,德、法关系和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在总体上来讲是比较顺利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德法合作进一步扩大到安全防护领域。德法防务理事会以及德法混合旅的诞生,便是其合作的重要结晶。德法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也带动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1984年欧共体关于预算摊款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妥协方案,从而扫清了欧洲一体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次年,欧共体又通过了《欧洲一体化文件》,决定在1992建成共同体内部“统一的大市场”。这些都是在德法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的。由于德法合作共同推动西欧联合的发展,因而80年代广泛流传着德法是欧洲联合的“轴心”、“双缸发动机”的说法。这些不仅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为后来科尔致力于在欧洲和平中实现德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重视加强德、美关系和西方联盟的同时,科尔也没有放弃“新东方政策”。美国《新闻周刊》在1983年发表文章评论说:“和德国其它许多保守党人一样,科尔也认识到,东方政策可能比西方联盟政策更有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尽管这一政策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②。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德苏关系迎来了转机。科尔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改革开放政策将有利于德国统一,于是便开始大力推进德苏关系。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为振兴苏联经济而努力,急需与联邦德国这样一个技术发达、资金充裕的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所以,双方一拍即合。1988年和1989年,双方不仅在环保、文化、食品、贷款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而且还使德苏两国间的交往从政治、经济领域发展到军事领域。“新东方政策”的继续与加强,不仅使德、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缓和,而且还带动了联邦德国同整个东方集团关系的改善。这无疑有益于改善联邦德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逐步软化苏联领导人对德国统一强硬的反对态度,为日后使苏联交出通向德国统一大门的最后一把钥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对外政策方面,科尔政府不仅延续了以缓和、对话和谈判为重点的东方政策,与此同时,明显加强了西方联合政策。与其前任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温和的大西洋主义相比,强化同美国以及西方盟国间的伙伴关系重归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心。另外,借助日益缓和的东、西方关系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外交环境,科尔政府虽唯美国马首是瞻,但也与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建立起比较密切关系,从而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不断创造和积聚了有利的条件。

三、密切两德关系,增强民族情感

科尔执政后,在改善两德关系、增强民族情感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两德人员往来、家庭团聚以及扩大双方的广泛合作与交流。这在经济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为了缓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渐恶化的国际局势,以及改善两德间人员往来以及旅游交通,联邦德国政府针对民主德国外汇紧缺的困境,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分别向民主德国政府提供了10亿马克^③以及9.5亿马克^④的贷款。联邦德国此举的动机在于,借助经济关系这一纽带,以缓和和发展同民主德国的政治关系。对于两德经贸活动在改善两德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及其积极意义,科尔也曾在其政府声明中多次提及。

为了能够使两德经贸活动能够进一步发展,科尔甚至不惜动用提高“无息透支贷款”、增加无偿经济援助,减免民主德国债务等手段。果然,1983年德国内部贸易额比1982年上涨了8%,交易额达到了152亿联邦马克,其中进、出口都增长了8%^⑤。到1985年达到了80年代的最高峰,双方的交易额为167亿联邦马克^⑥。科尔执政时期,两德还共同签订了许多重要的经贸协议,例如:1984年11月12日,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民主德国签订的一项合同,计划在民主德国建造一条年产30万引擎的生产线,并从1990年开始,每年在民主德国生产的10万引擎回销至联邦德国大众汽车总厂,这项

①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 665.

② 维尔纳·马泽尔:《科尔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③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p. 889~891.

④ Heinrich von Siegler(Hrsg.). Archiv der Gegenwart. Sankt Augustin: Siegler, 1984, pp. 27912~27914.

⑤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 555.

⑥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6, p. 554.

合作计划总值达到了5亿联邦马克^①。这项经贸协议对进一步增强两德间经贸联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到了80年代后半期,民主德国迫于其西方外债的不断增加,开始采取了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政策。自1986年起,德国内部贸易额总量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是,民主德国的对联邦德国出口额仍然持续上升,1988年为2%^②,而1989年上半年增至6%^③。这说明联邦德国仍然是民主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并且,后者从这种贸易活动中受益不浅,但同时也增加了对前者的依赖性。

作为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积极的经贸政策的主要回报,民主德国逐步放松了对两德间旅游交通方面的限制。1983年,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为64 052人,比1982年增长了40%。由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或经过民主德国去第三国旅游的人数大约为302万人,同比1982年增长了4.6%。只有来自民主德国领取养老金的旅游者人数比1982年的155.4万人少了5.8%^④。自1984年开始,以上三项指标均呈上涨趋势。到了1986年,来自东德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更是达到了24.4万人,而1985年只有6.6万人。来自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或经过民主德国去第三国旅游的人数增至为379万人,此外,来自东德领取养老金的旅游者访问联邦德国的人数也上升到176万人^⑤。毫无疑问,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人员交往不断地维护着德意志共同的民族情感。

科尔在其执政期间,也十分重视两德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访问与会谈。例如,1984年和1985年,科尔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与昂纳克进行了会晤,最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⑥。此外,1987年9月,昂纳克接受科尔的邀请,对联邦德国进行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不仅是两个德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有利于欧洲局势的进一步缓和。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关于环境保护、防止核辐射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三个协定。次年5月,科尔又以私人的身份回访了民主德国,进一步推动了两德高层领导人间的接触。

两德间各个方面交往的扩大与加深,有利于实现联邦德国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维系了民族的同一性,加强了民族的沟通,增进了民族的感情,民族的共同性不会因长期的相互隔离而削弱或消失。两德之间敌视的减少,接触和了解的增加,使共同的历史文化意识、民族同一性意识得到了维持和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1983年虽然美、苏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破裂,再次掀起冷战小高潮,但两德间却营造出缓和的口号和氛围,如“永远不再在德国土地上发动战争”、“两德责任共同体”、“两德安全共同体”^⑦。1989年底,在民主德国举行的一股股游行示威浪潮中,民主德国公民更是打出了“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一个民族”^⑧的鲜明标语,德意志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再次被强烈地唤醒。

由此可见,在科尔执政期间,两德间经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德人民相互间的了解与交往不断加深,两德高级领导人的接触和对话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德意志民族情感以及实现统一的愿望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从而,在客观上为日后两德最终抛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一切分歧,重新实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下台后的昂纳克对记者所说的:“是过去的岁月已经在为在统一的德国大家庭里友好地共同生活打下了基础。”^⑨

四、把握历史机遇,促成德国统一

1989年秋,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民主德国局势发生骤变,尤其是“柏林墙”的开放,为两德统一迅速提上议事日程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科尔能够牢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坚定而灵活的统一外交,在统一进程中充分扮演了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时,正值科尔总理出访波兰,以至于他在得知“柏林墙”倒塌时说“自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呆在不适当的地方”^⑩。但是,科尔不久便意识到这对德国统一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在11月28日,即“柏林墙”倒塌仅19天后,科尔在事先没有同美、英、法三国商讨的情况下,公开发表了一份《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计划》,把德国统一问题再次明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德国的统一必须获得苏、美、英、法四大国的认可,其中苏、美两国是关键。对此,科尔政府一方面针对苏联经

① Marin, Ernst. *Zwischenbilanz: Deutschlandpolitik der 80er Jahre*. Stuttgart: Bonn Aktuell, 1986, p. 104.

②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9, p. 603.

③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9, p. 1315.

④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4, p. 557.

⑤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7, p. 119.

⑥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5, p. 446.

⑦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and 4*, Bonn, 1986, p. 30, p. 160, p. 188, p. 236.

⑧ Elvert, Friederike. *Deutschland 1949–1989: Von der Zweistaatlichkeit zur Einheit*. Stuttgart: F. Steiner, 2003, p. 202.

⑨ 《倒台:昂纳克答问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⑩ Karl Hugo, Pruys. *Kohl: Genius of The Present: A Biography of Helmut Kohl*. Chicago: Edition Q, 1996, p. 261.

济上的困境,积极展开银弹攻势,许诺为在民主德国的苏军的驻扎、撤离和回国安置提供120亿联邦马克的费用,外加30亿联邦马克的无息贷款。此外,科尔还要求欧洲共同体向苏联提供15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另一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利益,科尔表示,德国统一后,苏联在原民主德国的37万部队可以留驻至1994年。在此期间,北约机构将不扩展到原民主德国境内,德国只在此驻扎不属于北约的领土防御部队;苏联撤军以后,德国可以驻扎属于北约的联邦军,但只能装备常规武器;外国军队不得进驻原民主德国境内,也不得在那里部署和迁移核武器以及核武器运载系统;其中向苏联保证,德国统一后,军队将裁减到37万人。就这样,科尔以巨额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对苏联的安全承诺为代价,最终换取了苏联对德国统一的首肯。

与此同时,科尔充分借助德意志人民不断高涨的民族情感,积极实行“以内促外”的策略,对美、英、法等西方盟友表示,坚决忠于北约和欧洲共同体,保证统一后的德国不走特殊道路。科尔强调,统一后的德国“既不能中立,也不能非军事化”,继续留在北约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此外,科尔政府还明确承认波兰西部边界,排除了牵制两德统一的一个重大障碍,以此来极力说服美、英、法三国同意以“2+4”的模式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进而掌握了统一德国的主动权。科尔的这些措施,有效地打消了西方盟友对两德统一的疑虑,最终赢得了美、英、法三国对两德统一的支持,同时也加强了联邦德国同苏联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讨价还价的筹码。

针对民主德国,科尔凭借联邦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实行了首先推进民主德国演变、接着实现两德经济统一、最后完成两德政治统一的三步走策略。在民主德国举行竞选期间,科尔为了帮助以民主德国基民盟(其姊妹党)为主体的德国联盟能够获得选举胜利,不仅许诺将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而且还多次到民主德国参与助选。在其选举获胜之后,科尔为了尽快与民主德国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以实现两德经济统一,甚至不惜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在关键的两德马克比价问题上对民主德国做出让步,两德也由此迅速达成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这项条约使民主德国全面接受了联邦德国市场经济制度,为两德统一的迅速完成彻底铺平了道路。

随后,两德又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至此,德国重新实现统一水到渠成。最终,民主德国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之规定,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并入联邦德国。科尔说:“在一个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下,这应是一条通过一步步改革和调整来实现统一的道路。但是,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将会缩短这一政治时间。”^①

纵观德国统一迅速启动的这段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政府自始至终是按照其所制定的德国政策来完成德国的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最终统一也的确是在保障欧洲的和平这一框架下完成的。联邦德国也是以将重新统一的德国融入到欧洲联盟为前提条件换来西方三国对其统一的支持和应允。最终,伴随着欧洲分裂的结束,德国也结束了自身长达41年的分裂历程。当然,两德统一也要归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科尔政府也因此有了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舞台。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科尔执政后所采取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德国政策与外交活动,综合了联盟党和社民党德国政策之精华,是符合当时国际局势发展变化要求的,在促进德国重新统一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科尔政府开展有重心的平衡外交、密切两德关系、激发两德人民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及能够紧紧抓住20世纪80年代末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及东欧剧变这一“历史机遇”,通过成功的“统一攻势”和“统一外交”,解决了德国统一的内、外部障碍,并利用德国人民要求统一的民族激情,迅速地实现了德国统一。当然,决定和促成德国重新统一的因素不仅仅是这些。德国的最终统一是德意志人民固有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及德意志人民对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苏联调整对德政策和东西方关系的急剧变化,联邦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论怎样,科尔政府为德国重新统一所做出的贡献绝对是不可抹杀的,也正因如此,它才被永远地载入人类历史的光辉史册之中。

●作者简介:王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桂莉

^①Doris G. Wolfgramm. *The Kohl Government and Germany Reunification: Crisis and Foreign Policies*. Lewiston: E. Mellen Press, 1997, p. 166.